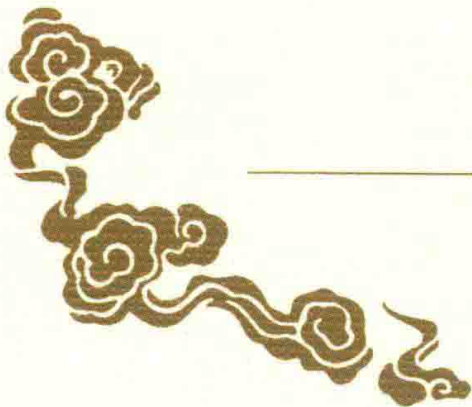


★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丛书

市场中的民族与国家

论加德满都游客区的族性动力机制

李静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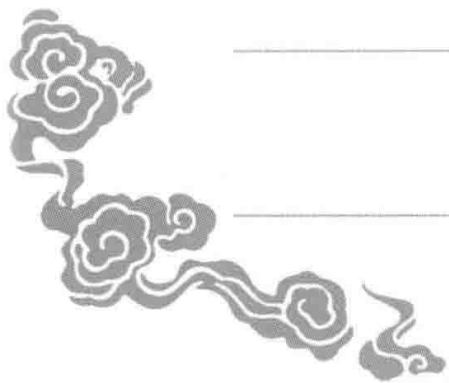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丛书

市场中的民族与国家

论加德满都游客区的族性动力机制

李静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中的民族与国家：论加德满都游客区的族性动力机制 / 李静玮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

(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3255 - 2

I. ①市… II. ①李… III. ①民族性—研究—
加德满都 IV. ①C955. 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344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马 明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44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罗中枢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卓	左卫民	石 硕	卢光盛
次旦扎西	李 涛	周 平	周 伟
姜晓萍	姚乐野	徐玖平	盖建民
傅其林	樊高月	霍 巍	

总 序

边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包含历史、地理、政治、民族、社会、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涉及国家形态、历史演变、族群关系、文化形貌、治国方略、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边疆地区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通道，是国内与国际两种风险叠加地带，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

边疆研究涵盖现实与历史交汇的宏大领域，中国边疆研究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关系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到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西部边疆地域辽阔，边界漫长，民族众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发 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情况特殊而复杂，从精准扶贫到民生改善，从资源开发到生态保护，从民族团结到反分裂斗争，从边界争端到周边经略，从加快发展到“一带一路”建设，一系列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

边疆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建设任重而道远。边疆是什么？边疆是如何形成的？边疆的生成和变动机理是怎样的？边疆有哪些形态、特征和演变规律？边疆与国家、主权、边界、边境、疆域是什么关系？边疆与历史、地理、政治、民族、人口、资源、文化有什么关联？边疆在当代治国理政、民族统合和地缘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边疆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有何作用？边疆学有哪些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边疆学与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有什么关联和区别？这些都是边疆学应当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近年来,“治国必治边”渐成共识,中国边疆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边疆研究的专门机构,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相关成果在服务国家安全、发展和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边疆研究和边疆学学科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尚未实现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独立设置;问题导向的政策引导力度不够;单一、封闭、分割的科研管理机制束缚较大;多学科、多部门、多地区协同研究不够;与边疆密切相关的边疆理论、国家安全、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周边国别与区域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成果转化机制还不健全;评价上重数量轻质量、重学术轻应用;边疆研究和边疆治理人才的培养滞后;理解国家战略、熟悉边疆实务和了解边疆社情民意的人才紧缺;边疆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不多;等等。这些不足,致使学界和实务部门难以就边疆重大突出事件、反恐与维稳、安全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综合应对之策。

国际政治史表明,大国崛起必须要有充分的智力支撑。西方国家在确立大国地位的过程中,都曾提出过与各自国家战略相适应的边疆理论和方略。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边疆概念不断拓展,次生和衍生的边疆概念不断呈现,边疆研究的视域、范式和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等重大科技成果,不仅拓宽了人类的视野,而且拓展了我们对边疆的认识。当今的边疆,不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底土等领土边疆,而且包括利益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太空边疆等战略边疆;边疆不仅与边界、边境及陆域、水域、空域相关,而且与海洋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防控识别区以及大洋洋底、极地、外太空、电磁空间、网络空间等相关;边疆不仅与国家主权、领土、利益密切联系,而且与地缘政治、周边环境、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交错关联。“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国家利益的外溢,中国迫切需要用传统与新生的边疆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和平崛起,解读并维护国家利益。”^①

2012年12月,四川大学联合云南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国

^① 朱碧波:《论我国边疆理论的言说困境与创制逻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以兴边富民、强国睦邻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目标，以现实问题为重点，兼顾周边区域和国际关系，开展多学科的边疆研究，积极推进边疆学理论建设和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学、边疆人类学、边疆安全学、边疆经济学、边疆管理学的发展，努力发挥在理论创新、资政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的功能，服务于边疆稳定与发展，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服务于周边睦邻友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2017年，四川大学已经把“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建设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将聚焦边疆安全与发展，瞄准世界学术前沿，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决策咨询与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边疆学学科建设，努力将中国边疆研究的独特视角、理论和方法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为此，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策划了这套《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丛书》，丛书将不拘形式，重在创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罗中枢

2017年11月15日

对于初访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游客而言，泰美尔区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这里位于古老旧城的边缘，却犹如一幅喜马拉雅地区全球化的缩影——狭窄的街巷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正左顾右盼，四周的店铺中，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不丹的商人与伙计都在为生计忙碌。除了采购菩提佛珠、手绘唐卡和青铜佛像，人们可以在街角的餐厅吃上一顿地道的印度东北菜，住进藏式风格浓郁的家庭旅馆，或者为前往珠峰预定机票及夏尔巴向导。在万花筒一般纷繁复杂的景象之下，流动的人群与商品并非泰美尔区的全部，区内的东道主——纽瓦尔人的传统文化依然鲜活生动，而作为统合各民族差异的整体概念，“尼泊尔人”的身份认同也以别样的方式于此呈现。

摘 要

在现今的民族学理论中，族性（ethnicity）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中，族性被理解为共同体、共同体的特点及共同体的认同。同时，这一概念所涉及共同体也在不同的研究中被划入民族、族群的范畴。从其概念的模糊边界和伸缩属性可知，族性本身具有动态的特点。在都市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为，市场中的族性如何变化？为回答这一中心问题，笔者在研究地——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游客纪念品市场，同时也是游客住宿区的泰美尔区进行了为期 12 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两项分别以商户和游客为研究对象的问卷调查。基于前一阶段的人类学实地调研资料，本书结合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使用历史文献方法，对前一阶段的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进行了验证、总结和补充。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主位与客位、微观与宏观的反复对比转换，对族性的变化规律进行族群、种姓、民族及国家向度的探索。

本书认为，在市场语境下，族性的变化主要因循原生性、现代性和流动性三方面的动力因素。在三动力中，原生性来自多元人群在其成长环境中所接受的文化传统，是族性及其认同变化的初始依据；现代性产生于时间与空间的相互分离，引入了内部差异性极大的民族变量，并通过具有民族理性的日常实践，反映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联；区别于原生性的相对静止和现代性对发展的追求，流动性则是模糊、不稳定的，通过文化、生计和生活向度上的流动，它建构着族性中跨结构和新旧交替的一面。

在本书讨论的案例中，现代性和流动性是区内族性变化的主要方

面。为集中笔墨探讨前述中心问题，书中主要论述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对泰美尔族性现代性的研究中，本书从时间和空间两章对其做了描写、分类及意义阐释，并在第五章进行了基于问卷数据的具体分析，认为区内的现代性引导了东道主民族主义的产生，使民族的边界向国家延伸。其次，对于泰美尔族性的流动性，本书认为，一方面，基于第三章和第四章对区内人与物流动性的研究可知，族性的流动性是建立在区域商品及民族流动模式的特点之上的；另一方面，通过前面的数据，在第五章中，本书进一步解读了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的解析概念，在尼泊尔民族问题中所引起的内部矛盾。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摩登的族性	(1)
一 定义族性	(1)
二 族性如何变化	(5)
三 小结	(16)
第二节 尼泊尔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综述	(17)
一 西方的尼泊尔研究	(18)
二 尼泊尔本土人类学	(29)
三 中国的尼泊尔研究	(33)
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	(35)
一 研究地点	(35)
二 族性及其相关问题	(36)
三 研究架构	(39)
第一章 空间	(43)
第一节 空间速写	(43)
一 空间历史	(43)
二 主要路段	(57)
第二节 从住房到办公室	(61)
一 泰美尔的空间特点	(62)
二 空间的三重属性	(64)
三 小结	(80)

第二章 时间	(83)
第一节 泰美尔的一天	(83)
第二节 东道主生活与游客阈限	(87)
一 东道主的日常与节日	(90)
二 全球化阈限：全年无休的游客	(97)
三 东道主的时间策略	(99)
四 小结	(104)
第三章 人群	(107)
第一节 市场中的民族流动模式	(107)
一 泰美尔本地房东的民族结构	(108)
二 泰美尔商户的民族结构	(115)
三 泰美尔的游客构成	(120)
四 小结	(122)
第二节 边缘群体	(125)
一 定义“边缘”	(125)
二 人群	(126)
三 小结	(133)
第四章 商品	(134)
第一节 物的流动	(134)
一 流动的符号	(135)
二 流动的追逐者	(138)
三 流动与民族文化	(139)
四 小结	(143)
第二节 泰美尔与菩提热	(144)
一 从村落到泰美尔	(146)
二 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	(148)
三 木头变黄金背后的内外网络	(154)
四 小结	(160)

第五章 族性的动力机制	(163)
第一节 原生性、现代性与流动性	(163)
一 原生性	(163)
二 现代性	(164)
三 流动性	(169)
第二节 现代性与族性	(171)
一 泰美尔的现代性	(171)
二 现代性下的族性生成机制	(172)
三 小结	(179)
第三节 流动性与族性	(180)
一 尼泊尔族性的整合进程	(181)
二 流动性：民族矛盾形成关键	(187)
三 小结	(191)
第六章 结论	(194)
第一节 回顾	(194)
第二节 结论	(197)
附 录	(200)
参考文献	(205)
后记 走进泰美尔	(221)

绪 论

第一节 摩登的族性

一 定义族性

族性是什么？该词源于英语中的 ethnicity，但 1933 年版的牛津英语字典尚未收录该词，直至 1972 年版才见于附录。1953 年，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作品首次使用了族性一词，20 世纪 70 年代，在对美国民族熔炉政策的讨论中，这一概念得以普及。^① 1962 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格拉泽（Nathan Glazer）与学者兼政治家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合作，对纽约市的各少数族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证明，来自世界各地的族群并未形成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概念，而是保留了原先的族群归属感和认同意识。^② 这一研究正式使用了学术意义上的 ethnicity 一词，并推动了美国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其后，出于对族性问题的敏感，莫氏还于 70 年代末公开预言了苏联的解体。^③

在英文学术界，族性缺少一个明确的经典定义。在该概念产生早期，族性被简单而模糊地定义为“族群归属的状态”“民族自豪感”，或者将族性与族群、种族等概念混同。^④ 不过，随着国家治理的渗透，

① Nathan Glazer, Daniel P. Moynihan ed.,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

②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 MIT Press, 1963, 1970, p. 22.

③ 东来：《Ethnicity（族性）：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读书》1996 年第 8 期。

④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 MIT Press, 1963, 1970.

族群之间、族群文化和国家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增多，过去文化层面的抽象术语逐渐变得孤立而僵化，失去了原有的解释力。^① 在这一背景下，族性成了一个可以得到广泛运用的重要概念。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民族研究术语，它所涵盖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原生特质产生和逐渐稳定的过去，也可以延伸至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当下，既包括了内部认同，又牵涉跨族交往以及相关影响，可用来统合现有关于民族和族群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以帮助理解作为共同体的民族/族群及其与周边民族、国家、区域之间的关联及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界也开始广泛关注和使用族性一词。^② 对于族性的定义和旁涉范围，我国学界此前存在一些相关讨论，但依然未在概念上达成统一。在国内的前人研究中，对族性的解释极为丰富多样，包括族群实体、族群基本要素、民族/族群认同、某一民族的文化特点、民族本质等。^③ 由此可知，族性所指涉的主体包括民族、族群等相关概念，旁涉概念则涵盖了特质、认同、本质等，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在运用上也表现出极为模糊的特点。^④ 如在我国西南研究中，对于族性的认识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族性体现在文化体系、社会组织及社会行为等方面，是理解研究对象的一个整体性概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族性分散于族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可通过对各个主题推进相关研究，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讨论。^⑤

族性概念是在学科的分叉与地域的交织中被碎片化的。首先，这种情况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在民族这一论题上出现的复杂交叉。不同学科的考察视角使其表现出的主要特征

① Nathan Glazer, Daniel P. Moynihan ed.,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4.

② 王希恩：《族性与族性认同》，《中国民族报》2003年6月3日第3版。

③ 丁瑶：《“族性”一词在中国的运用》，《民族论坛》2013年第9期。

④ 将族性作为民族性、族群性和二者共用的例子，可分别参见彭兆荣对瑶族叙歌的研究，巫达对上海人族群意识的研究，以及沈海梅对白族人族性的研究（彭兆荣：《族性中的音乐叙事——以瑶族的“叙歌”为例》，《音乐艺术》2001年第2期；巫达：《论大都市人的族群意识——以上海人个案为例》，《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沈海梅：《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学术探索》2010年第1期）。

⑤ 沈海梅：《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学术探索》2010年第1期。

存在着较大差别。其次，在不同语言的翻译上，族性一词不断经历着语境转化，以致难以与此前的语义完全对应。其在新进入的语言系统中旁涉的近义词也往往与此前存在出入，故容易导致借义和语义泛化。最后，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族性也并非一个一开始就受到足够重视的关键概念，而是在概念生成的时间序列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性、全球化和群体认同而诞生的新问题。从英文词义演变的角度而言，族性是过去“部落”(tribal)一词的延伸，但在演化的过程中，它又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涵盖力的母题(the parent concept)。这一概念的泛用被认为来自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中存在的解构主义，学者们长期关注于族性一题的各个子方面，如认同、文化政治、亲属关系、婚姻等经典命题，却没有对族性本身进行充分的重视。^①

在对其变化进行讨论前，首先依然需要对族性进行明确的定义。且以绫部恒雄对族性的综合性定义和其关注的几个方面为例，进行初步的概念分析。绫部认为，族性是“二战后，在被称为人种、民族、国家、宗派等范畴的人类集团之间的急剧多样化、流动化和相互交往中所产生的，一般小于这些集团规模的，并且不属于共同来源而共有文化同一性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意识”。这一概念包括了人群和人群特点两类基本的定义，而在分析族性的时候，绫部认为需主要关注其四个方面：其一，具有古典民族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的共同体族性；其二，针对个人的民族统一性做出规定的民族性；其三，对集团的边界做出规定的民族性；其四，作为利益集团而明显化的族性。^②

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可见其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领域里几大理论的影响。首先是时间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问题。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对现代民族的经典论述视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现代民族产生的重要时间点，也是现代性进入的关键时期。其次，“人类集团之间的急剧多

^① Ronald Cohen, "Ethnicity: Problem and Focu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7, 1978. Hal B. Levine, "Reconstructing Ethnicit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5, No. 2, 1999.

^② 朱伦、陈玉瑶编：《民族主义：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页。

样化、流动化和相互交往”是共同体产生的缘由，对此，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曾从族群边界的角度进行过论述。最后，在前述族性的四个方面，除了第一个方面与民族传统上的文化意义相连，其余都是现代性发生后的事件和属性，即从国家、政治生活、现代民族和语言使用问题等方面出发，对民族属性进行的强调。以语言为例，安德森认为，语言可以产生能内部沟通的精英阶级，通过印刷术和语言学家的的工作，语言被标准化和确立下来，而那些精英阶级所使用的优势语言，则可以通过国民教育和其他途径，在近代国家中确立其作为国语的地位，并推动民族主义的产生。^①

因此，即便现有理论中存在多样化的族性定义，但依然有几点可以确定。其一，与族性相关的主体不限于特定的族类概念，而是随着具体历史场景的变化进行转换的共同体。其二，族性的概念范畴包括其共同体本身、共同体意识和相对外化的共同体特征，在前述不同的学者笔下，这三者的关系呈现出差异化的逻辑结构，而对三者的侧重也各有不一。其三，文化与种族是判断族性的主要依据，同时，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还往往受到外部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因素的影响。^②

鉴于族性定义的多样性及其在不同语言中存在的差异，以下讨论的族性综合了前述对于族性的不同定义，并侧重中文语境中对其属性含义的强调。即将族性视作现代民族诞生后，构成族群、民族等族类共同体认同的基本属性，如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③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也有学者将外部的政治、经济因素视作族性的一部分。例如，兰杰（Terence Ranger）认为，在非洲，族性相当于政治意义上的部落制，族性与血缘有着复杂的关系，但不一定相互重合。此外，格拉泽与莫伊尼汉早期也强调族性与政治的密切关联，但后期又对文化的重要性进行了调和。参见[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英]斯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此处的定义主要参考了王希恩对中文语境下族性的定义，即所谓族性，应该是指能够构成各种族类群体的基本要素，包括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参见王希恩《族性及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严庆：《族性与族性政治动员——族类政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管窥》，《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6期。